



泰国曼谷—全球化时代的性别、发展与公共政策—研讨会的报告

李慧英

2005-10-18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 李慧英

2004年5月17-19日，泰国曼谷亚洲理工学院（AIT）社会性别与发展学中心（GDS）、荷兰社会学学院（ISS）和英国利兹大学联合主办《全球化时代的性别、发展与公共政策》国际研讨会。

参加会议的人员达到一百来人，来自英国、荷兰、美国、中国、印度、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柬埔寨、越南、日本等20多个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亚洲国家，其中东南亚国家的比例最高，在会议上进行学术交流的发言者就有40多人。与会者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服装、不同的职业和不同的文化信仰，身份多样化是一个突出的特点。在这里，种族、国家、宗教和性别的多重身份，不再是书本上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研讨会的会址设在AIT的会议中心，会议中心的大厅里张贴着各种妇女/性别项目的宣传画，展放着性别研究的书籍与资料，构成亚洲妇女交流的静态平台。与此相映的是四个专题的动态平台：亚洲的性别、冲突、移民和人类安全；亚洲的性别、人权和社会政策；性别、经济发展、技术和企业；亚洲的性别、环境资源管理。在不同专题的研讨中，始终围绕着三个环节展开，第一，经济全球化。将社会性别与发展的主题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审视，交流和探讨中出现频率极高的一个新概念——安全。第二，公共政策，通常在研讨中也会涉及到政策建议，其逻辑线索是，先有性别问题然后再有政策，公共政策是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的，是逻辑上的终点。而这次研讨会，公共政策却往往作为问题产生的起点，成为引发社会性别与发展问题的诱因，作为制约性别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突出出来。第三，妇女组织与参与管理，在国家与社区包括NGO的关系中，强调妇女网络和妇女群体的自组织作用，女性参与管理和决策成为会议讨论的重要话题，凸现了公民社会的公民权利，特别突出了更容易受到忽视的妇女权利。

报告分为三个方面：

- 1 经济全球化与新“安全”概念的提出
- 1 公共政策：引发性别与发展问题的诱因
- 1 妇女组织与妇女参与决策

一、 经济全球化与新“安全”概念的提出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格局出现了急剧变化，两大阵营的“冷战”走向终结，单边政治逐渐转向多边政治，经济全球化使得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冷战时期曾经以某些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毁灭性武器，作为人类安全最大威胁的观点显得有些陈旧，而跨越国家和国界的新的不安全的威胁因素正在急剧增加，比如，跨越国家的人口贩卖，跨国移民的人身安全。新的安全概念正在成为预防人类威胁的一种新的分析手段。

会议特别关注两种不安全：一种是长期的骚乱和暴动，导致人们为了躲避危险，离开家园，成为流离失所的移民。来自印度的学者Mattoo在论文《冲突与性别安全》一文中揭示印度卡什米尔在14年的冲突中产生了大量移民，而妇女与儿童的境遇最为糟糕。妇女被恐怖分子绑架、强奸，受孕妇女遭受不安全的引产，居无定所，不少人感染AIDS，营养不良。对此，尚未引起印度政府及国内外NGO的关注。

一种是随着富国与穷国的差距的加大而产生大量非法移民，移民的流动一般的趋向是从穷国流向富国，东南亚的一些富裕国家成为移民的主要目标，比如泰国、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台湾、日本等。印度尼西亚的学者Wahyuningrum曾经在2003年2月至11月对于跨国进行的人口贩卖进行了深入调查，调查展示：这些被贩卖的受害者过着奴隶般的生活，无法选择自己的生活命运，常常整个家庭、亲戚和邻居被卷入贩卖当中，特别是妇女和女孩，他/她们往往是被诱惑出来的，遭到接连不断的盘剥、身体上及性侮辱，象奴隶一样受到监禁。新加坡的《海峡（STRAITS）时代》于2003年3月8日公布一组数字：菲律宾7400万外来劳工中有1600万是被贩卖来的受害者，大约65%的妇女被迫卖淫，菲律宾被贩卖来的儿童在15-17岁之间，占到总数的54%。联合国报告指出，世界上每年有15000万人被贩卖，仅仅在东南亚就包括25万的妇女与儿童。由此可见，在被贩卖的人口中东南亚地区妇女和儿童问题的严重性。

被贩卖人口中的妇女是会议关注的焦点之一。在一个按照阶级、种族、性别、年龄的不平等关系建立的秩序中，妇女与儿童往往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对此，已经成为此次会议的共识。而且，妇女的遭遇往往与性侮辱、性侵犯、性交易纠结在一起。所以，非法的女移民往往处于种族、国家、性别交织的最边缘位置，她们属于非法入境者，时刻处于担惊受怕和恐怖的状态中；她们属于其它的民族，语言不同，信息相当不畅；她们属于女性，在经济交易中大多被迫出卖的是身体和性。泰国学者Mary rose的论文《生活在边缘的人》调查了缅甸的移民母亲的脆弱性：缅甸的非法移民母亲在泰国生下孩子是不能接受教育的，她们的住处拥挤不堪，生病得不到医治，母亲和孩子没有安全感，在社区中面临着更多的危险。

通常对于这些非法移民，原有的禁止贩卖人口的法律中往往视为“罪犯”，近年来正在出现一种新的提法即“受害者”。原有的法律往往将他们作为打击的目标，而现在开始关注到他们的人权。东南亚的学者从移民的安全和人权视角来审视禁止贩卖人口的法律规

定,开始将人权观念与非法移民和人类安全联系起来,试图通过公共政策视角的调整来遏制贩卖人口的罪犯。她们指出:印度尼西亚颁布的《保护由于性侮辱、贩卖人口、卖淫的儿童受害者》的法律规定,对于贩卖人口的罪犯监禁只有12年,显然处罚太轻了,不能对罪犯进行足够的处罚,对受害者提供真正的保护。

二、 公共政策:引发性别与发展问题的诱因之一

现代社会,各国政府都要制定国家发展计划,这些规划对于社会结构和两性发展带来什么影响,是这次会议探讨公共政策与性别发展关系的一个视角。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基本转变为工业化、城市化国家,在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等农业人口比例相当低,她们关注的发展问题已经不再是农业的女性化问题,而是外来移民问题,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女性就业中的性别角色定位问题。几乎,每一种社会转型和国家政策都会给男女两性带来影响,而这种影响都会与已有的经济政治和性别关系发生微妙的联系,使性别与发展的状况比起我们的假设要复杂得多。斯里兰卡学者Anula Attanayake指出,过去的20年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已经出现—全球化,全球化跨越了原有社会关系的时空概念,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框架。在市场化 and 全球化的进程中,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有酬就业的工作岗位,从无酬劳动到有偿就业,对于女性来讲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经济领域的跨越。然而,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定型的性别规范依然市场化过程中塑造着职业女性,正在依靠看不见的手将职业性别化。职业女性时常扮演的是性别文化规定的情感照顾和服务角色比如电话聊天女郎即白领女郎。这种职业强化女性定型的工作形象,迎合传统性别文化的口味。女性的性别角色定型化正在成为市场化过程中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

而老挝、柬埔寨、中国等国家的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女性在农业中的作用,以及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女性化问题,这与这些国家的农业化程度过高有关系。柬埔寨直到1989年开始市场化的进程,1993年进行全民选举,柬埔寨的经济得到很快发展,但依然有80%的农村人口。与中国的情况类似,也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的问题,在农村大部分农活都是依靠妇女来完成的,农村的男子季节性到城市打工,增加收入。未婚的年轻妇女也被城市生活所吸引,离开农村。中年妇女成为农业劳动的主力,而这些中年妇女几乎很少接受教育,面临着在农业劳动中继续学习的问题。老挝是个多民族国家,平均寿命只有50来岁。83%的人在农村生活,农村的食品卫生问题非常严重,直接威胁到农民的健康。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宋一青注意到:中国的一些农业政策没有看到由于农村男子的外出导致妇女在农业中担任重要角色,而土地和信用卡依然在农村妇女的使用上受到种种限制,建立与之适应的新政策非常迫切。在探讨农业女性化的问题时,泰国、日本等国家的历史似乎值得警惕。在它们经历由农业化转向工业化过程时,同样出现了男工女耕的现象,后来妇女们也不安于在农村种地了,跑到城市,导致大片土地撂荒,泰国只好依靠粮食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亚洲其他经济发达国家汲取什么经验教训?避免发达国家已经出现的历史不致完全重演呢?

在探讨国家政策与性别发展的关系时,学者们还注意到国家政策还常常不自觉地制约着性别的平衡发展,扩大两大性别之间的社会差距。公共政策的这种影响往往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打个比喻,当国家政策出台后,首先涌动的波纹可以直接冲击的是某个阶层,而相继出现的波纹才会触及到同一阶层中的性别关系。在一些经济发展为主导的国家,经济建设通常成为优先考虑的目标,比如建大坝解决用电问题,而通常忽视了经济目标会对搬迁居民生活人权的影响,常常导致经济发展与搬迁居民的冲突与矛盾,而很少考虑在两者之间寻找一个同时兼顾的平衡点。随着搬迁居民利益的损失,又会波及到家庭,而家庭中的性别关系使得妇女成为最大的受害者。英国学者Carol Yong探讨1948年以来马来西亚大坝的建立给马来土著居民带来的影响,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原居民丧失了土地拥有权,在异地重建家园,妇女和儿童丧失的资源更多。针对国家政策导致的对性别发展的负面影响,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到公共政策如果缺乏性别敏感性往往导致性别发展问题的诱因。

考察公共政策的性别价值取向,成为此次研讨会的一个重要话题。来自日本东京大学的Mari Osawa教授指出日本的社会政策倡导的性别角色是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照顾家庭,非常限制两性的均衡发展。尽管,日本男女的性别角色已经发生变化,但传统的要求依然根深蒂固。一项调查统计表明,40%的女性结婚后选择在家,而60%的女性结婚后依然参加工作。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有68%的人做兼职,每周要做35个小时的家务。男人在家务的投入上每天只有10分钟,男性依然主要扮演养家糊口的角色,经济压力非常大,2002年前的五年内,男性40-50岁的自杀率达到三万人。随着日本经济上的不景气,社会福利的削减,不愿生育的妇女在增多,人口生育率在不断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使得日本的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恶性循环。而改变这一切需要政策建立男女两性工作与家庭的平衡机制,改变原有的性别价值取向,倡导女性参与社会工作、男性分担更多的家庭责任。

在这次会议上,与公共政策议题相比,性别平等机制受关注的程度似乎逊色得多。但是,是否具有性别平等机制,具有怎样的性别机制,又反过来影响到公共政策能否实施,能否转化为现实。通常,在讨论性别平等机制的时候,往往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在政府机构中单独建立妇女机构,容易边缘化,难以进入政府主流领域。于是,大力倡导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建立相应的机构。而在缅甸,性别平等机制似乎走了一条相反的路子,它1996年建立的时候,叫做妇女事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分散在社会福利、劳工、教育等部门,实施1997年制定的五年妇女发展行动纲领,到了2003年发现效果不佳。于是,2003年12月改为妇女联盟,妇女联盟包括三个层面:第一,国家中心委员会,中间是各级妇女代表,底层是中心执行委员会。这一机构的作用还有待考察。如何评价缅甸的机制发展轨迹?恐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至少可以有三种假设:第一,从当性别敏感还尚未被政府部门普遍接受的时候,政府部门中的性别机构就难以发挥作用,难以使得妇女发声,而只有通过某种机构使妇女的各种力量凝聚起来,才可能发出声音?就是说,性别机制的发展具有阶段性。第二,如果缺少强大的社会性别意识作为思想基础,在政府部门中设立的性别机制就容易流于形式。在缅甸性别敏感的意识依然薄弱。第三,妇女NGO的制衡力量还没有形成,不足以有效地监督政府部门的政策实施。

三、 妇女组织以及女性参与决策

从会议提交的论文中,还可以看到一个跨越国家的普遍现象: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制度,妇女的能力和贡献总是被忽视,妇女问题往往不受关注。内蒙是以畜牧业为主的国家,大约82%的面积为草原,草原是主要的再生自然资源。蒙古《自然资源可持续发展项目》指出,在畜牧业私有化实行以后,妇女进行的无报酬与无法评估的工作增多了,在畜牧家庭中超过70%的工作量是由妇女完成的。马来西亚的学者指出:马来西亚的女工对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女工中出现的问题很少引起政府关注。如果说,各个利益群体的代言人都出现在会场上,聚光灯经常对准的是强势群体,女性群体尤其是弱势阶层的女性群体往往处于角落里,最容易受到忽视。于是一个最能够描写弱势群体位置的词汇出现了一边缘化。

如何改变女性边缘化的处境,女性不再成为被遗忘的角落?通常,中国人的思路会倾向国家依赖或政策依赖,等待出现一个英明的领导者,制定考虑妇女的政策,最终促进妇女的位置改变—由边缘移向中心。而亚洲大多国家的学者则倾向于发挥妇女自组织的力量,

从妇女自身寻找动力源，从而推动政府调整政策，渐渐改变妇女的状况和位置。所以，几乎在所有的关注性别与发展问题的论文中，妇女都视为能动的主体，妇女的自组织和主动参与都是改变现状的起点。由此出发，在政府与妇女组织之间形成一种正向互动关系。例如，在解决移民妇女困境的对策中，研究者注意到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在移民工作中的责任，政府应当注重妇女项目，为他们修建房屋，使妇女受到教育。二是建立移民妇女组织，动员社会资源，进行针对母亲儿童的教育、卫生等培训，在这些组织之间形成相互支持的力量。在移民妇女组织之外，研究者对于相关政策的监测评估也可以视为另外一种妇女组织行动。这种知识女性组织的作用，可以说介于政策评估和移民妇女需求之间，一方面发现了解妇女的需求和利益，一方面要求政策考虑满足合理需求，形成移民妇女之外的另一种推动力。在这里可以看到在公民社会中公民意识的觉醒，正在形成现代社会及制定公共政策的制衡力量。

事实上，并不是任何一个地区的妇女都会自然而然组织起来。马来西亚的学者在探索当地的女工受到忽视的原因时，发现女工缺乏组织是一个重要原因。于是，开始探讨女工何以组织不起来，进而发现政府的一些政策限制了妇女组织的发展，多种族工人阶层的分离缺乏凝聚力。如何消除妇女组织起来的障碍，使妇女组织起来可以发声，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切入点。围绕着妇女组织，与会者从两个方面展开探讨：第一，为什么一些妇女组织建立不起来，哪些因素限制了它的建立？第二，妇女组织怎样利用和控制社会网络？怎样在发展项目中促进妇女参与管理？尼泊尔环保项目在保护森林的组织中专门建立了只有妇女参加的妇女组织，让女性从事管理，创造妇女惟一空间的策略，调整与男子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有的环保项目要求男女在管理中有一定的比例，学会合作、调整原有的性别关系，发挥女性的管理能力。这种探讨大多是在实践项目中展开的，未能在理论上进行深入论述。

在公共政策的研讨会上，关注妇女NGO组织的建设与发展，是特别意味深长的事情，可以说是推动性别发展的一项战略，非常值得中国妇女推进性别发展过程中借鉴。如果，在大陆没有诸多的妇女组织，依照法律争取自身的权利，要想在公共政策上形成向弱势群体倾斜，几乎是不可能的，韩国和台湾在1990年代出台的弱势群体的社会福利政策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大陆妇女组织显然没有形成一支有力的力量，怎样体现NGO的原则和精神？怎样共享资源和信息？怎样扬长避短优势互补？都是值得考虑和探讨的问题，也需要不断探讨同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交流。

四、体会与建议

1、到泰国曼谷参加此次会议，收获是多方面的。一个最大的收获是改变着我对亚洲一些国家的看法。过去，总以为亚洲国家除了日本都差不多，落后贫穷、社会治安混乱。泰国曼谷的良好社会秩序、AIT的人性化校园管理、泰国社会的开放和社会风气，使我开始重新审视亚洲一些国家。我发现在泰国同样有四根柱子在支撑着这个国家，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社会保障和宗教。

2、应当扩大与亚洲国家与地区妇女组织的合作及交流。

当中国的国门打开以后，我们的目光几乎不由自主地聚焦在欧美国家，很少关注我们身边的亚洲国家。其实，亚洲国家的发展经验对于我们更具有借鉴意义，因为我们有着更多相同的文化、更多相似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一些国家已经经历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阶段，妇女组织在推进性别主流化的倡导和运作上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智慧。这些经验和智慧值得我们在政策倡导上借鉴。

3、重视妇女组织的建设。项目的开展与组织发展结合起来，并尝试按照公平、公开、监督的原则进行组织管理，应当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奠定组织基础；妇女组织可以形成不同的侧重点，行动性、研究性或行动性兼研究型；反思妇女NGO中的问题，促进妇女组织自身的成长与发展。

姓名: 邮箱: 电话:

[发表评论](#)

[重写](#)

您是第 

Microsoft VBScript 运行时错误 错误 '800a000d'

类型不匹配: '[string: ""']

